

目次

论文

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

——一个合约理论的视角 滕 飞(1)

信息逆差:代码权力膨胀与公众权力让渡 施颖婕(21)

大语言模型能用来给主题模型中的主题编码吗?

——兼论大语言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的前景

..... 李 代 张博伦 周浥莽(33)

数字时代的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

——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钟瑞雪(60)

新闻大数据视角下测度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新路径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李 军 董方杰(84)

解密数字社会中的幸福密码

——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下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机制研究 郭媛媛 张 腾(103)

研究报告

- 数字时代安全科技价值报告 …… 陆菲菲 秦 昊 张友红 吕 鹏(133)
- 问题触发的算法模型响应机制探索 …… 许正军 袁 岳(153)

译文

数字健康的社会技术伦理

——生命伦理学进路的批判和延伸

…… 詹姆斯·肖 约瑟夫·多尼娅 著 何 丽 译(166)

书评

数字资本主义和智能技术的当代批判

——评《过度智能》 …… 周银知(186)

访谈

通过人类行动思考机器智能

——专访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 …… 露西·萨奇曼 胡万亨(198)

CONTENTS

THESIS

The Flexible Accumulation Mechanism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A Contract Theory Perspective	Teng Fei(1)
“Information Deficit”: Code Power Inflation and Public Power Cession ...	Shi Yingjie(21)
Can LLM Label Topics from A Topic Model: The Future of LLM in Social Science	Li Dai, Zhang Bolun, Zhou Yimang(33)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Zhong Ruixue(60)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in News: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	Li Jun, Dong Fangjie(84)
Decrypting the Happiness Code in the Digital Society: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Trust and Fairness Percep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under Different Internet Usage Levels	Guo Yuanyuan, Zhang Teng(103)

RESEARCH REPORTS

Report on the Value of Security Techn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Lu Feifei, Qin Hao, Zhang Youhong, Lyu Peng(133)
Exploration of Algorithmic Model Response Mechanisms for Problem Triggering	Xu Zhengjun, Yuan Yue(153)

TRANSLATED TEXT

The Sociotechnical Ethics of Digital Health: A Critique and Extension of Approaches from

Bioethics written by J. Shaw, J. Donia; trans. by He Li(166)

BOOK REVIEW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Smart Technologies: Review of *Too*

Smart Zhou Yinzhi(186)

INTERVIEW

Thinking Machine Intelligence Through Human Actions: An Interview with Anthropologist

L. Suchman L. Suchman, Hu Wanheng(198)

信息逆差：代码权力膨胀与公众权力让渡

施颖婕^{*}

摘要：在与算法阶层信息的交易中，互联网用户让渡易被解读、引导和操控的信息（包括各类身份、偏好、言论及动态信息）以换取所需信息，这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换将其置于信息逆差境地。公众从信息顺差地位走向信息逆差地位的过程，正是互联网从赋权转向集权的“技术倾向性倒置”社会化过程。信息逆差表现为认知、意识及行为三个方面的信息权力让渡：在认知维度，信息过滤与信息推荐形成的人工壁垒引致认知局限，资讯轰炸下的注意力中断与大脑机能超荷导致注意力失焦、记忆滑坡等认知障碍；在意识维度，对“奶瓶乐”喂养的成瘾导致个体的信息能动性降低；在行为维度，数字审查强化了个体的自我规训与主动服从，标准化、自动化的数字暴力带来更高的强制力。

关键词：信息交易 信息逆差 权力让渡 技术倾向性倒置

一、信息逆差：从“信息消化”到“信息换取”

在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完成人类文明从暴力权力（muscle power）向资本权力（capital power）的转变之后，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则被预言或将实现人类文明从资本权力到知识权力（knowledge power）的再次跃迁（Toffler, 1990）。相应地，作为向公众提供迅捷知识渠道与充量信息资讯的技术，互联网被期待将权力分配去中心化并赋权于公众。但反观现实，互联网似乎并未带来民众理性自由的增加，个体从未如现在这样可以轻易地被认识、引导与操控（Susskind, 2018）。

对此，我们往往聚焦于互联网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去思考这一影响，利用“信息茧房”“回音壁”等理论以解释为何信息越多却自由越少。然而，在强调信息

^{*} 施颖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消化效应的同时,我们似乎容易忽略互联网在信息流动中的双重身份。民众在作为信息消费者接收互联网信息的同时,也通过互联网使用向商业公司和政府让渡出使自身更易被解读和影响的内部信息。由于互联网兼具信息供给方这一显性角色与信息收集方这一隐性角色,个体对互联网信息的消化障碍只是上述困境的部分成因,更符合全景的、深层的原因可能涉及个体在与算法阶层信息交易中的劣势地位。

在这场信息换取中,一方面,算法阶层利用数据垄断、数据自缚、数据欺骗等信息特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普通民众从互联网上获取知识的范围与深度,使个体获取的信息愈发碎片化和窄化;另一方面,个体在接受互联网服务的过程中,无意间出让了大量重要的个体信息,包括客观的身份信息与主观的消费偏好、认知倾向等。这些重要的隐私数据的暴露,极大程度上增加了个体的可解读性,从而使个体更容易被预测、引导和操控。

可以说,数字技术用看似庞大浩荡的信息供给换取了用户重要的个人信息。由于前者是显性输送的,后者是隐性输送的,我们常常被这场交易中一面的信息增量所迷惑,忽视了这场交易的结果其实是一种信息逆差。借由认知、意识、行为三个维度,这种信息逆差地位带来的权力博弈结果是公众权力的让渡。

二、认知维度:人工信息壁垒与信息处理机能

互联网将原先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话语结构变得扁平化,个体在成为有力的信息生产者与传播者的同时,获取信息的途径得以多维化。因此,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环境中,用户似乎对知识触手可及。然而,一方面,在信息获取维度,用户所接收到的信息大都是其被允许看到的或是被鼓励看到的那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在信息处理维度,人类的生物机能决定了即时呈现、数量庞大的网络信息给用户带来的可能并非骤增的真相与智慧,而是焦虑、紧张及有意识的短路。

(一) 信息过滤与信息推荐等感知控制下的认知局限

斯塔尼斯瓦夫·莱姆(S. Lem)曾在《技术大全》中预测,当人类社会发展至信息巅峰时,每一种文明都会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人工的信息环境,形成一种有

助于堵住多余信息的文明胞囊(莱姆,2022)。反顾当下的信息环境,这种推断似乎并不夸张。互联网已经被用于更精确、更广泛地控制我们传递和接收的信息,从而控制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

其中,信息过滤决定了用户被阻止看到什么。它内嵌于搜索显示、通信等诸多信息传播环节。当用户利用互联网搜索内容时,搜索引擎决定了某项查询将被哪些结果优先响应,哪些结果排名靠后而类似于不存在,哪些结果被丢失了以至于无从了解(Epstein, 2016)。^① 即使用户在进行社交软件上的内部隐私交流时,也会受到过滤器的监视与影响。通信技术受制于基于禁用词的即时审查已经成为一种广泛趋势。

信息推荐则影响了用户容易看到什么、容易重复和灌输哪些主题的内容。叙事的重复将带来相关知识与信念的内化,这是因为人们对信息真实性所做出的判断是建构出来的,信息的曝光程度越高,其被用户接纳的可能性越高。相关研究发现,人们依赖三种推断方式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基础比率(base rates)、感受(feelings)以及与记忆中信息的一致性(memories)。其中,基础比率是指人们倾向于从可能性的角度去预设信息是否真实。由于人们认为所见的信息大多数都是真的,因此当人们看到自己并不了解或看不懂的信息时,会倾向于认为它是真的(Chater, Tenenbaum & Yuille, 2006);“感受即信息”理论(feelings-as-information theory)指出,人们会将自己的主观体验当作事实证据(Schwarz, 2001);最后,人们根据与已有知识和存储在记忆中的源信息的一致性进行推断(Unkelbach & Rom, 2017),相比于只呈现过一次的信息,人们更可能相信呈现过三次的信息为真。通过上述三种机制,重复会加强信息的真实性感受,从而呈现出“虚幻的真实”(illusory truth)(Brashier & Marsh, 2019)。

综上,信息过滤与信息推荐作为数据垄断的两个维度,同时控制着社会的信息流动,以至于社会的常识性认知、道德认知、社会感知都受其引导。通过让人们确信自己的某些想法是错误的、可耻的、孤立无援的,从认知层面阻止人们越轨;通过让人们相信一些理念与做法是光荣的、道德的、普遍的,从而鼓励其遵从相应的行为。即使人们出于信息的“留白恐惧症”(horror vacui)(Swirski,

^① 90%的点击产生于搜索结果的第一页,因此,排名太靠后的信息在用户视域中等于不存在。

1997)而不断向大脑填充知识与资讯,也只是搬运了被挑选过的“事实”与“真理”。

(二) 信息超荷下的认知障碍

除了上述人工信息壁垒所带来的选择性供给问题,海量的信息烟尘对人们的知识消化构成了生物机能上的挑战,并带来紧张、焦虑等情绪,产生与信息获取初衷背道而驰的负面结果。超负荷的信息获得正在让人们丧失过去那种平心静气、全神贯注的线性思考过程,取而代之的是简单杂乱、越快越好的新思维模式(卡尔,2010)。而从信息处理效能的角度而言,信息接收并非越多越快越好。

一方面,就信息荷载本身而言,人的大脑中存在一种名为“延迟神经元”的构造,其主要功能是延缓神经元之间的神经传导,有助于大脑理解复杂的观念与自我意识,为个体对信息的消化和吸收带来秩序、协调(沃尔夫,2012)。而当沉浸在数字化资源中时,人们从缓慢的、深思熟虑的过程中被剥离出来,弱化乃至丧失评判与挖掘信息背后意义的能力。

另一方面,就信息加载的节奏而言,互联网信息往往以多线方式呈现给用户。这种旨在分散人注意力的机制成为一个中断系统,使个体在从事某项脑力任务时被频频打断。而多项脑力任务之间的切换会加剧个体的认知负荷,导致思维分散、记忆力减弱,妨碍个体的正常思考,并带来紧张、焦虑的情绪(卡尔,2010)。可以说,互联网的多端化信息加载模式提高了思考的切换成本,从而增加了人们忽视或曲解信息的可能性。

三、意识维度:“奶瓶乐”喂养与自由饱和幻象

随着互联网以技术资本(Romele, 2020)的形式被科技公司所垄断,它部分演变为榨取和售卖用户注意力的获利工具。科技公司利用数据监控、存贮和建模向广告商贩卖确定性,基于大量AB测试结果而不断优化的互联网产品设计影响用户行为,诱导用户朝广告商期待的方向行动。在这一过程中,用户在频繁的点击中消耗注意力来供养和奖励这个体系,沦为信息能动性低下、政治自主性缺失的“算法燃料”。

(一) 注意力榨取与工业喂养下的信息能动性流失

在 Web 2.0 的流量逻辑下,媒体与用户在供需关系中的相对位置发生更迭,媒体的主营业务从传统的向用户售卖信息转变为向用户购买注意力,通过流量变现而盈利。与此同时,双方在供求关系中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媒介提供的信息资讯从需要付费订阅的稀缺品转变为泛滥的廉价品,因此用户的注意力就成为商业平台竞相追逐的稀缺品。

正因如此,基于争夺用户注意力这一趋利逻辑,商业媒体将精心准备的内容投喂给用户,从而最大限度地掌握用户的注意力以获利。正如美国网飞公司(Netflix)2020年发布的纪录片所揭示的,科技公司设计产品时的核心逻辑便是心理学上的成瘾理论,他们利用情绪钓饵,成功地让个体在积极正强化下越发陷入技术商业逻辑的圈套与操纵之中:个体不知道哪一次能够刷到合适的内容,或者说不知道下一次能刷到什么,这种随机性奖励不停地刺激着用户继续使用下去,类似于赌场中老虎机的成瘾方式,不同的是前者更为持久、精确地向机器输送了个体偏好等使其更容易被操控和塑造的信息。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 Cowen)指出,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Cowen, 2002)。

当下网络环境中部分负面化、极端化、泛娱乐化等倾向,正是用户信息能动性降低、公共理性丧失的表现。以负面化为例,个体对负面事物的关注往往超过正面事物,这种负面倾向(negative bias)(徐贲,2019)被商业媒体在流量运营中利用,出现了对负面标签的滥用。同时,由于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能对人产生更为持久、显著的影响,在大量用户都缺乏必要的信息素养以应对源源不断的负面信息注入时,负面信息容易给用户带来负面感知与表达的增加。这种公共理性的丧失与社会的碎片化,与自由的衰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林奇,2017)。

(二) 自由饱和和幻象下的政治自主性缺失

算法技术利用“算法黑箱”隐藏起权力运作的过程,并将其幻化成用户自由意志的狂欢。人们自认为在线上享受到了较线下生活更为充沛的自由,其自由意识开始变得十分淡薄(袁媛、李娜、王灿发,2023)。正如徐贲所言,担忧这种

自由意识的丧失,其实就是担忧社会中个人与权力的关系(徐贲,2019)。

尽管互联网已经并将继续扩充诸如学习、娱乐等自由,然而自由的内在形式与自治(对内在自我的掌控)密切相关。卢梭和斯坎伦(T. Scanlon)曾指出,屈从于自身欲望的引导并非自由,让人们只受欲望的支配形同于奴隶制(Rousseau, 1968; Scanlon, 1972)。在“奶瓶乐”喂养下,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抛弃相互竞争的行动自由,开始享受奥德修斯解下绳索走向塞壬的自由、瘾君子的自由。用户在将精力投注于娱乐化、表浅化等主张即时满足的信息消费行为时,所支付的成本是政治自主性的减退。

公民的政治主体性关乎其担负公民责任与行使公民权利的欲求与能力。当公众不关切世界危机、社会癌症等长远的问题,而只沉醉于此时此刻的情绪满足时,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在意识上相互隔绝、没有共同诉求和共同行动的空壳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孤独的个人无力争取自由,分崩离析的群体也难以保卫自由(徐贲,2019)。这是因为,相比于获取现成信息,对社会和政治信息深层的思考、分析和判断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力量和解放。

四、行为维度:数字审查与数字化武力

韦伯(M. Weber)将精确、迅速、明晰的官僚制奉为最有效的政治控制体系(韦伯,2010),而数字技术无疑正成为这台精密仪器重要的内置结构。随着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系统性渗透,赛博空间与物质世界的界限逐渐模糊,数字技术对公众的影响已然从线上空间扩张到线下空间,亦从认知层面扩张到行为层面。日渐强大的代码权力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

(一) 数字审查下的自我规训:服从性增加

数字时代的审查会通过外在的审视达成个体的自我规训。这种规训权力深入个体内心深处,触摸他们的身体,并植入每个人的行动和态度,植入他们的话语、学习过程及日常生活,它们比武力强制或武力威胁更为全面、有效(Foucault, 1995)。

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对象正在“去显化”,数据收集过程变得越来越隐

蔽,人们在难以注意与察觉的情况下被自动监测与采集数据(Kelly & Hamm, 2014)。同时,数字审查存在私密化的发展趋势,它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此前被视为私域的地方,导致无法画出安全领域的边界线。当人们了解自己正在被观察时,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思考放弃规则之外的行为。因此,尽管数字审查也许尚未无孔不入,但意识到数据收集与数字审查的隐蔽性又无力辨别数字审查是否在场,这种压力驱使人们出于对不良后果的担心而时刻谨慎。

另一方面,相比于人类记忆或纸质版记录等传统的记录载体,数字审查所得到的电子信息可能永远不会失忆,对个体产生的影响能够跨越一生甚至延至后代。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遗忘是常态(Mayer-Schonberger, 2010),遗忘扮演着重要的社交角色,帮助我们挥别过去的失败和尴尬,重启新的人生阶段;但在数字生活世界中,“过去从未逝去”(Faulkner, 2012),就像谷歌公司曾公开承认它保存了用户输入的每条搜索记录和他们随后点击的每一个搜索结果,尽管某次不道德的搜索、某次违背意识形态的言论暂时潜伏在某个角落,但它们可能在半个世纪后还被调用、分析甚至用于审判。

不愿承担反叛代价的人变成了一个自我监管的主体,致力于不懈的自我监视活动。个体的每一条言论、每一个行为都可能被捕捉和保存,并用于在未来某个时刻突然决定其是否被剥夺某种权利、错失某种机遇,甚至遭遇某种非难,这会迫使个体向这种不确定性投降,在发言、行动前小心地评估言行是否越轨或存在被后来社会定义为越轨的风险从而谨言慎行。

(二) 数字化武力下的外部约束:强制力增加

莱辛(L. Lessing)曾指出“代码即法律”(Lessing, 1984),因为当我们与数字技术互动时,我们需要服从代码的指示。鉴于代码与法律运作方式的区别,萨斯坎德(J. Susskind)提出了一种更具启发性的表述——“代码即权力”,它能让我们去做只有武力、操纵等权力形式才能让我们就范的事情,它定义了我们可以做与不可以做的事情,并通过控制个体对外界事物的感知来施加影响(Susskind, 2018)。代码权力被国家作为新的治理工具时,可能带来比以往作为治理手段的传统成文法更为强大的约束力。

其中,代码治理让传统成文法的“事前威慑,事后惩罚”转变为更具强制性

的“事前阻止”。相比于成文法利用事后惩罚以引导个体遵纪守法的选择,代码权力让个体除了遵守规则之外别无选择。正如凯尔森(H. Kelsen)所言,法律实际上并不能禁止任何事物,它只是要求官员对特定行为进行相应的制裁(凯尔森,2021);代码权力不是警告个体“请勿进入”,而是直接设置了限制使其无法进入(Lessing, 2006)。

与此同时,代码执行具备标准化、自动化的特征,比传统依靠人力层层传递执行的方式更为迅捷高效。代码生产出的指令比自然语言更为明确和标准,并不留有解释上的灰色空间供舞弊。同时,代码权力的自动化执行极大缩减了选择性、抽查式执法的局限,大大提高了侥幸漏网的难度。

五、讨论

(一) 信息逆差下的权力博弈

互联网是一个权力争夺的地带。与任何权力一样,互联网权力关乎谁是信息的掌控者,以及谁的信息被人掌控(徐贲,2019)。当公众交给互联网的信息(包括身份、偏好、言论及动态)价值大于公众从互联网获得并吸收的信息(被操纵的知识与信息烟尘)价值时,公众就进入了一种信息逆差地带。随着这种不平等交换的持续,公众权力逐步让渡于代码权力。

一直以来,我们似乎都对互联网传播抱着某种预设,认为公众是互联网的服务与解放对象,以至于常常将互联网对公众的信息供给作为思考当前传播困境的起点。然而,互联网在成为普通民众信息工具的同时,也正成为权力机构与科技公司借以扩充权力的技术资本。纵使尚未悲观地认为互联网真实的顾客上帝已转变为权力机构与科技公司,而个体已沦为互联网生态圈的燃料,也不该只关注这场不平等的信息交换中公众获得的信息馈赠——我们交出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其中,公众在有意识或无意识情况下出让的个人信息,对于权力机构与科技公司解读、预测和控制个体的价值毋庸置疑;相比之下,公众所被允许、被鼓励获得的信息对于提升智识、改善其现实境遇的作用可能有限。

在信息逆差之下,公众权力让渡于代码权力的路径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种。

在认知层面,信息过滤机制所铸造的人工信息壁垒限制了个体的认知发展,信息轰炸则使个人的生物机能陷入难堪而思维涣散、情绪焦虑、难以深度思考。在意识层面,科技公司为榨取用户注意力以盈利,而向公众投喂精心设计的“信息鸦片”,致使用户高度依赖信息投喂,对信息的检索与反思能力降低;在“奶瓶乐”泛滥之下,公众沉迷于即时的情绪满足与消费快感,淡漠于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公共事务的良性参与、公民权利的坚守,逐渐丧失政治自主性。在行动层面,数字审查导致个体的自我规训,数字化武力则加强了对个体行动的外部制约。

(二) 互联网的社会化:从赋权到集权的技术倾向性倒置

温纳(L. Winner)曾提出“技术倾向性”(tendency of technology)这一概念,意指任何技术都存在一定的倾向性,会让某些人得利而某些人失利,有些技术是民主的,有些技术本身就是集权性质的(Winner, 1980)。然而,正如科林格里奇(D. Collingridge)所言,“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Collingridge, 1980),互联网亦是如此。互联网进入中国社会的30年,是公众从信息顺差走向信息逆差的过程,也正是自带权力解放这一设计逻辑的技术从赋权到集权的倾向性倒置过程。

在21世纪伊始的Web 1.0时期,作为一项脱嵌于现实社会结构的新型技术,互联网被赋予了创建“数字化理想国”的期待,也确实曾带来公共讨论的短暂繁荣。门户时代初期,在网络讨论较高的经济门槛与自驱力门槛下,知识精英作为公共空间创建与经营的核心群体,汇聚诸多具有高包容度的论坛,展开对政治、哲学领域的严肃讨论与观念争鸣。高质量信息传播的智识门槛进一步阻隔了低文化层次用户的网络表达,从用户结构维度维护了这一知识精英及其追随者的文化生态圈。在这一阶段,社会权力分配的演变大致遵循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自身技术逻辑,“技术初速度”主导了互联网的影响,尽管这种信息流动的解放因为参与成本的高昂而局限在知识精英阶层。

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带来网络运用近乎地毯式的普及,赛博空间中脱嵌的“天空之城”终归还是回归凡尘,互联网落地于民情、商业、政治制度等客观社会结构之中。至此,互联网“技术初速度”主导的时代被终结,在商业趋利逻辑、代码治理等“结构加速度”的叠加下产生了技术倾向性的倒置。人类

社会的复杂性曾使得权力阶层难以完全理解——因为无法实现充分控制(Hayek, 1945),但数字技术极大地削弱了人类活动的不可解读性这一对抗权力的力量,来自机器传感器的海量数据正成为总数据愈加占主导性的根源以用于更为系统化、精密化的偏好分析、行为预测与引导(Kelly & Hamm, 2014)。代码权力作为一种崭新的权力类型,赋予算法阶层前所未有的强大支配力量。

从这一意义上讲,当互联网技术悬浮于线下社会时,其权力解放的技术倾向性可以在部分群体中得到局部施展;而一旦技术沉降入社会去普遍地连接、影响更多人,则非但不能为更多群体带来解放,反而因其广大的用户基数而成为资本与政治竞相攻占的目标,其技术倾向性在社会化过程中被倒置。

(三) 信息逆差的群体性差异

随着代码权力对个体日常生活日益系统化的影响,了解算法在平台、服务和搜索引擎中的功能与影响,并能够尽可能有意识地、批判性地与之互动,便成为个体所能触及的一种重要的数字力量。因此,对算法的感知和意识在人群间的分化会带来不同群体在与互联网信息交易中的差异化地位。新近的相关研究发现,对算法的认知与否的群体间差异正在导致新的强化型数字鸿沟,对算法驱动的推荐内容的态度及算法认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显著相关(Gran, Booth & Bucher, 2021)。由此可见,尽管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尔(J. Ellul)曾指出的,容易被愚弄和操纵的不仅仅是信息素质较差的群体,知识分子也不例外(Ellul, 1973),信息逆差成为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一项普遍特征,但信息交易中的逆差程度仍存在较为显著的群体性差异,用户底层化与信息逆差可能存在更深的关联。

一方面,当法律框架与逻辑推演框架离场、争论脱离事实基础时,诉诸情绪成为网络讨论最为便捷的途径。这也是为什么低收入、低学历群体的情绪和言论相对而言更具煽动性,更容易被“红鲱鱼”“烟幕弹”等互联网上破坏公共理性的搅局手法所牵引。另一方面,信息烟尘更加符合底层群体的信息消费偏好。投入大量精力和经济在网站上的人较小概率是现实生活充实的人,“奶瓶乐”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安抚被现实社会边缘化的80%的人,用令人陶醉的消遣娱乐产品填满他们的生活,转移其注意力和不满情绪,从而安定下来。

相比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容易掌握门槛较高但更为多样化的信息途径,对信息投喂的依赖性整体较低,仍保留较高的信息能动性 with 主体性。尽管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网络话语空间中的“底层抢占”使得理性、中立的纠偏往往遭到淹没、驱逐而失语,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新卢德主义(neo-Luddism)审视互联网对个体权力的影响,对“数字家长主义”的反思愈发频繁地出现在意图规避审查的语言加工、free 等利用数字锁链按时屏蔽社交媒体的手机应用、增强隐私的密码学等旨在数字救赎与技术抵抗的行为中。

参考文献

- 卡尔,2010,《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凯尔森,2021,《纯粹法学说》,雷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 莱姆,2022,《技术大全》,云将鸿蒙、云将鸿蒙二号机、毛蕊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
- 林奇,2017,《失控的真相:为什么你知道得很多,智慧却很少》,北京:中信出版社。
- 韦伯,2010,《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沃尔夫,2012,《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王惟芬、杨仕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徐贲,2019,《人文的互联网: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袁媛、李娜、王灿发,2023,《算法推荐时代的技术规训与价值重塑》,《新闻爱好者》第10期。
- Brashier, N. & E. Marsh 2019, “Judging Truth.”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1(1).
- Chater, N. , J. Tenenbaum & A. Yuille 2006, “Probabilistic Models of Cognition: Conceptual Foundation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0(7).
- Collingridge, D. 1980,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London: Frances Pinter.
- Cowen, T. 2002, *Creative Destruction: How Globalization Is Changing the World's Cultur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llul, J. 1973, *Propaganda: The Formation of Men's Attitudes*, J. Lerner trans. , London: Vintage.
- Epstein, R. 2016, “The New Censorship.” <http://www.usnews.com/opinion/articles/2016-6-22/google-is-the-worlds-biggest-censor-and-its-power-must-be-regulated>.
- Faulkner, W. 2012, *Requiem for A Nun*, Maryland: Vintage Books.

- Foucault, M. 199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ran, A. -B. , P. Booth & T. Bucher 2021, “To Be or Not to Be Algorithm Aware: A Question of A New Digital Divid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4(12).
- Hayek, F.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 Kelly, J. & S. Hamm 2013, *Smart Machines: IBM's Watson and the Era of Cognitive Computing*, New York: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 Lessing, L. 1984, “Looking Back [Man of High Fidelity: Edwin Howard Armstrong].” *IEEE Potentials* 3(3).
- Mayer-Schonberger, V. 2010, “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 *World Future Review: A Journal of Strategic Foresight* 2(1).
- Romele, A. 2020, “Technological Capital: Bourdieu, Postphenomenology, an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Beyond the Empirical Tur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1).
- Rousseau, J. -J. 1968, *The Social Contract*, M. Cranston trans. , London: Penguin.
- Sacnlon, T. 1972, “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
- Schwarz, N. 2001, “Feelings as Information: Implications for Affective Influences 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L. Martin & G. Clore eds. , *Theories of Mood and Cognition: A User's Guidebook*,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Susskind, J. 2018, *Future Politics: Living Together in A World Transformed by Te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wirski, P. 1997, *A Stanislaw Lem Reade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Toffler A. 1990, “Power Shift: Knowledge, Wealth, and Viol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Powershift Knowledge Wealth & Violence at the Edge of Century* 5(4).
- Unkelbach, C. & S. Rom 2017, “A Referential Theory of the Repetition-Induced Truth Effect.” *Cognition* 160.
- Winner, L. 1980,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Daedalus* 109(1).